

译介之旅

荷兰作为主宾国,在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为中国读者奉上了一场全面多元的文化展示,特别是荷兰文学方面的展示和中荷作家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日前,记者就荷兰文学翻译及小语种翻译等相关话题,采访了我 国知名荷兰译者施辉业先生。

记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上,为大众所熟知的荷兰作家和作品似乎并不多,这种现象是否 与荷兰本身的文学状况和我 国荷兰语翻译方面都有关 系?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 国荷兰文学翻译的历史和现状。

施辉业: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成为世界 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其帝国现在没落了,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在其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16世纪中期的《荷兰独立宣言》是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榜样。当时,许多文学或半文学作品,包括爱拉斯谟·斯宾诺莎、笛卡尔、克劳修斯、冯德尔、惠更斯等的作品,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做了思想准备,还记录了那个时代荷兰人的思想和生活变化,对于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中期发表的批判殖民主义制度的《马格斯·哈弗拉尔》是荷兰文学的里程碑,也是当时世界上影响最大的3本书之一。它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荷兰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此外,《马格斯·哈弗拉尔》是用“白话文”写的,它启动了荷兰的语言改革。

20世纪的荷兰文学一直很活跃,但真正的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最著名的书当日是犹太姑娘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共产党作家图恩·德弗里斯的《红发姑娘》、穆利斯的《暗杀》等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忙碌的蜜蜂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地下抗德出版社,现在已发展成为荷兰的主要出版社之一。它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配图诗歌《十八个死者》,是为纪念在“二月大罢工”中牺牲的18位烈士和遭盖世德国法西斯而创作的。

二战后的荷兰不乏关于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人们内心世界等问题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表现进步或左倾的倾向,有的对欧洲的前途深感悲观,

我第一次接触《芬尼根的守灵》(以下简称《守灵》)是在1995年,当时准备写一篇关于乔伊斯的课堂报告,《守灵》是乔伊斯为数不多的长篇之一,属于必读书,于是我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开了这部很多人认为不可读的书。不少大概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开始《守灵》之旅的,从这点说,是乔伊斯的名声成就了《守灵》。

这种毫无准备的阅读对多数著作来说并无大碍,甚至是常态,但是以这种方式阅读《守灵》往往读不完3页,因为《守灵》是一部需要借助参考资料来阅读的书。乔伊斯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还在创作的时候,他就不断向资助他的韦弗女士,向包括贝克特在内的他的那些追随者、向《守灵》的法语译者解释书中许多词语的含义。如今,他的解释性笔记已经成为《守灵》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幸运的是,经过70多年,而不是他自己所说的300年的共同研究,《守灵》的很多词句都被或多或少地破译了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当代便捷的信息交流手段。

不过,如果不想淹没在成堆的解读书籍中,乔伊斯也给了读者另外一条解读线索,那就是听。他在《守灵》中明确说“她自由写下的东西,如果对照耀的眼睛来说是惊恐,对分析的耳朵来说就是充满希望”。他常常给别人朗诵《守灵》,不少人听了之后说他们明白了,虽然读的时候看不懂。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守灵》中不少词语的拼写改变了,但是读音却仍然相近。事实上,在文艺复兴之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英语发音和书写,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的许多拼写是依据当地的发音,这就造成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守灵》根据发音造字,不求拼写的一致,正是回到英语形成的早期阶段。通过重视这种读写原则,乔伊斯在一定程度上把语言拉回到了它们久远的过去。

《守灵》的标题正是利用这一原理创造出来的。表面看“Finnegans Wake”可以译为“芬尼根们苏醒”,但实际上,这个标题是对19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首爱尔兰民谣“Finnegans’s Wake”的改写,其中的Finnegans(芬尼根们)与民谣中的Finnegan’s(芬尼根的)发音完全相同。对于一个爱尔兰读者来说,如果只听不看,他完全会以自己接下来听到的将是那首早已耳熟能详的民谣;而对一个只看不读的外国读者来说,则会把标题简单翻译为“芬尼根



施辉业,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掌握多种外语。1961年回国,80年代初开始业余时间翻译荷兰文学作品。1985年翻译荷兰文学名著《马格斯·哈弗拉尔》,该书为我国首部直接从荷文翻译成中文的荷兰文学作品。至今已翻译重要的荷兰文学作品近30部。

也试图从各个方面寻求出路。除此之外,荷兰的非虚构作品非常丰富,质量比较高,一般写得通俗易懂,常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包括政治类、社会科学类、道德伦理类、自然科学类、科普类等作品。荷兰当然还有非常多既富有想象力又富于深刻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连环画作品、图画小说、散文、小品、剧本等等。在“消遣性”和“娱乐性”作品中,有大量的“医生小说”(类似琼瑶小说的作品,因为小说里的女孩子都追求医生而得名)、游记、传记、侦探小说等。其中汉学家、外交官、作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十分著名。应该说,荷兰的文学作品极其丰富,质量也很高,不仅

们苏醒”。但事实上,这个标题的翻译曾让中国研究者大费周章,至今没有定论,丁振祺还在1998年撰文讨论了已有的各类译法。看似普通的标题之所以在翻译上引起如此大的混乱,是因为《守灵》的标题其实是典型的《守灵》自造语言的例子,翻译中遇到的困难正是《守灵》翻译困境的体现。

这个标题是乔伊斯经过苦思冥想才确定的。在提笔创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称这部作品为“正在进行中的作品”,这同样是一个富含深意的标题。事实上,无论研究者解读到何种地步,《守灵》都将永远是一部“正在进行的作品”,因为乔伊斯通过他的造词方式赋予了《守灵》前所未有的解读多重可能性,却没有设定解读的限度。拿“baubletop”来说,这个词可以解为Babel Tower“巴别塔”,上帝变乱人的语言之前人类共同建造的通天塔,但今天这个词更常用来指语言的混乱。“巴别塔”这个词在《守灵》中以及各种变体不断出现,在乔伊斯的心目中《守灵》就是一座巴别塔,既变乱了我們已有的语言,又带给我们通天的希望。不过,至此“baubletop”的解读并未结束。黑尔马特·赫林姆在《守灵》德语词典中提出Bau是德语词,意思是“建筑”,同时这个词中显然也包含着英语的“top”,意思是顶部或顶点,两者因此可以合解为“建筑的顶部”。这个翻译似乎更合乎上下文,因为该句说的是一个傲慢的大建筑师从顶部跌落。不过,这是读音却仍然相近。事实上,在文艺复兴之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英语发音和书写,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的许多拼写是依据当地的发音,这就造成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守灵》根据发音造字,不求拼写的一致,正是回到英语形成的早期阶段。通过重视这种读写原则,乔伊斯在一定程度上把语言拉回到了它们久远的过去。

有很高的知识含量,而且很多也具有文学之美。

但是,荷兰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远远比不上英、法、德、美、俄等国的文学。从来没有荷兰文学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事实。原因是荷兰文化和荷兰语的影响有限;荷兰小说讲述的问题往往“很荷兰”,很难吸引外国读者的兴趣;荷兰并没有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持有独特哲学或思想 的作家;荷兰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以前不重视自己文化在国外的宣传和传播等。

荷兰与中国的直接交往有400多年了,但双方的文学交流是很晚才启动的。荷兰人较早开始研究和翻译中国的一些作品,而中国人研究和翻译荷兰作品是20世纪的事情。据说,鲁迅和茅盾曾经译过荷兰语的短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格斯·哈弗拉尔》的翻译是个起点。但在90年代中期这项工作停滞了。原因是从那时起,中国出版社必须考虑花钱买版权和图书利润了,而荷兰书很难带来利润。当然还有政治和文化因素,例如两国政府都不过问,文化差距也很大,我 国长期不培养荷文翻译。

荷兰倒是注意了上述问题。为了促进荷兰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销售,荷兰成立了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是在欧洲范围内活动。资金来自政府、企业和欧盟。几经努力,打开了局面,荷兰作家和作品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受欢迎。有的作家在外国比在荷兰本土还出名和受欢迎。

2005年,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荷兰的注意,基金会决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通过参加北京书展,广泛联系出版社和翻译家,中国出版社已购置了数百本荷兰书籍的版权,翻译了约100本书(当然,与每年翻译300本荷兰书的德国相比还差得很远),绝大多数书是从英文或其他语种转译的。我自己目前已经翻译了基金会提供的30本书。荷兰今年担任北京图博会主宾国后,这个事业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但大的进步还需要假以时日。

记者:您一直从事荷兰语译介工作,翻译过社科、文学、文化类的不同作品,比如儿童文学图书《乙乙和丫丫》、传记作品《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等,翻译工作是一项比较苦的工作,需要译者的细心、耐心和恒心,您为什么选择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做翻译都有哪些感触可以和我们分享?

施辉业:我是在几代侨居国外的

华侨家庭出生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用外语读的,1961年19岁回国时才开始使用中文,后来懂得中文是在上大学和工作时自学的,水平一直很低。所以我翻译荷兰书籍首先是为了提高中文。其次,我想通过翻译有价 值的荷兰书籍丰富我对荷兰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认识,提高研究工作水平。再者,我想以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作点贡献。实践证明我的想法很有效,荷兰政府和文化界非常肯定我的努力,中国出版界、媒体和广大读者的反应也很积极。做翻译工作还有其他的收获,例如培养毅力品德,结交很多新朋友,也是很大的享受。

记者:您觉得文学、文化翻译和其他类型的图书翻译有哪些不同,或者说,两种文学、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翻译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施辉业:文学、文化翻译注重的是文字上的美。译者必须有很高的中文修养。在这点上我很欠缺,所以想在翻译中虚心向编辑和读者学习来提高水平。非虚构作品(科学、科普、技术、游记等方面)的翻译往往是以知识含量高为主要特点,注重的是准确性。如果译者知识面较窄,翻译这类书籍就很困难,而且会出错和出洋相。当然,前者的稿酬常常大大低于后者。

记者:在您看来,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而言,哪些素质是必须具备的?

施辉业:首先是要具有选择题材的素质。要多出对国家文化发展有益和对我国读者的文化素质提高有益的产品。

其次是业务水平要好。这包括外语(最好是几种外语)、中文、对外国和中国社会的认知和理解,都要有一定水平。翻译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不要认为自己外语较好,就是个好翻译,因为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还是出不了高质量的译品。

第三是要胆大心细,但也要谦虚谨慎。要敢于翻译,但要随时准备接受意见和修改作品。对文学作品美与不美的评判是有主观性的,要经常听读者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另外还要诚实,要对作者、对读者负责,不懂就是不懂,千万不能说不懂装懂。所有的译文都必须经得起推敲。

第四是要有毅力,要敢于克服困难。不认识的外语词或者一时想不出来的中译文,要反复深入查阅,甚至向专家和人 员询问。有时要为了一个词辛苦几天!

记者:我了解到,除了荷兰语之外,您还精通英语、德语等语言,您是如何看待转译的?比如有很多作品都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而是通过英译本、德译本等,这样转译成中文,会对中国读者接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施辉业:荷兰书籍很多都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等语言,翻译质量一般比较好。但是,因为英国、德国、法国等毕竟与荷兰还是有许多差别的,译本一般也会有一些东西与原 著是不一样的。读者肯定希望看到根据原著翻译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翻译荷兰书籍,应该尽可能翻译荷兰文原著,但可以参考其他语言的译本。这也是我常用的方法(正因此我知道转译是会出错的)。但是,因为外国没有几个能够翻译荷兰书籍的人,出版社选择转译的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目前,很多小语种专业都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特别是翻译人才,有人认为这会影响到我们与小语种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有人认为世界一体化,我们可以通过通用语言比如英语等来沟通和相互了解,您怎么看待小语种翻译人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有何建议?

施辉业:如何才能让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繁荣起来?如何不断丰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我觉得问题很复杂。首先是出版社面临很多新问题。如何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出荷兰书籍不能赚钱,我们不能强迫出版社出。荷兰文学基金会做的事情够吗?起作用吗?很有限!至于译者队伍的组织 and 培养问题,其实近几年来大学培养了大量的荷兰文人才,但质量如何呢?培养一批合格的翻译是很大的工程。谁来抓?还有读者的组织和培养问题。大众不如以前爱看书,而更爱看电视看电脑。我们如何让读者喜欢荷兰文学?这也需要做很多工作。当然,关心荷兰文化和文学的人也会慢慢多起来,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工作。目前做这种工作的人还太少。如果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要抓住以上几方面的工作,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媒体、社会团体、文化机构、书店、出版社等都可以动员起来。

另外我觉得,世界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将用一种文化取代各国文化。虽然英文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不会完全取代各国的语言。相反,大家越来越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生活的多样性和文学的丰富性。我 国应该而且也会重视小语种的翻译。

## 从《芬尼根的守灵》的标题谈全书的翻译

戴从容



戴从容,任职复旦大学中文系,从事英国和爱尔兰文学、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译著有《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等。现正翻译《芬尼根的守灵》。

历史分道扬镳。一部永恒的作品不能只记载精英们的政治活动,而必须与普通的爱尔兰民众几千年来 的生活传统联系在一起,这个传统不管好坏,无需评价,它是人类的经历,是集圣人与野兽于一身的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作为“Finnegans Wake”的声音层面的“芬尼根的守灵”指向个体泥瓦匠芬尼根的故事,他因为酒醉从墙上跌落死去,却因他的守灵仪式上发生争斗,有人将洒酒在他身上而复活。芬尼根的故事也是数千年普通爱尔兰人的生活经历。他酗酒是乔伊斯眼中爱尔兰人国民性的体现,他的守灵将读者引向爱尔兰几千年的民间传统,他的歌谣是民间文化世代不衰的传扬方式。

就这样,乔伊斯以天才的语言能

力,将“Finnegan’s Wake”稍加变形,成为“Finnegans Wake”,就举重若轻地使作品标题同时获得了丰富深远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而这不过是《守灵》全书词语变形的一斑,类似的内涵丰富的变化在《守灵》中俯拾皆是。不仅变形了的词语如此,未变化的词语由于乔伊斯改变了语法和上下文的关系,同样有可能在原来的含义之外加入其他意义。比如Firebugs(纵火犯)同样有必要解读为“Fir Bolga”,爱尔兰语中的“袋人”,即爱尔兰传说中的第三代殖民者。因为这一段也在讲述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的不少殖民者都被潜藏在叙述之中。面对这样的作品,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守灵》的翻译早已超越了翻译的范围,需要译者研究乃至创作。

在翻译《芬尼根的守灵》的开始,我曾设想通过词语变形将标题的各层含义都囊括其中,但是由于找不到能够完全对应的中文,最后决定选择其中的一个含义。至于为什么选择《芬尼根的守灵》而不是《芬尼根们苏醒》,是因为我觉得在“守灵”中包含着乔伊斯对生命更深邃而宏大的思考。一个关心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读者可能更青睐“苏醒”,但我觉得,当乔伊斯把《守灵》写成一条河,从“河水奔流”开始,结尾于向远方的无尽流淌,他更想传达的是人类历史流淌在来自遥远的古代而又向茫茫的未来延伸的河流之中。这河流既是时间之河,也是群体之河。不是河中搏击的少数伟人,而是这条大河才是真正的历史和生活。每个人,如同都柏林酒店老板一家一样,都是裹挟在滔滔人潮中的一滴水珠,组成了奔流不息的人类历史。在这点上,作为民间传统的“守灵”远比作为政治比喻的“苏醒”更给人传统感,更让人感受到时间的魅力。在乔伊斯最杰出的短篇《死者》中,他觉得死者在隔着窗户望着屋内的人群,而“守灵”这个词再次把死者与生者、历史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用《死者》结尾处的话说,“雪花穿过宇宙轻轻落下,轻轻落下,就像他们最终的坠落,落在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 中华文化“走出去” 外援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王 杨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近年来文化、文学相关部门和图书出版机构致力发展的热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给“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路途并非一帆风顺。人们逐渐认识到,“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积跬步才能致千里。翻译和出版就像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双腿,二者发展良好、互相支撑,才能使“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

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除了本土出版社和翻译人才的努力之外,外国出版机构和翻译家的积极译介更是不可或缺 的“外援”。为表彰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新闻出版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至今已举办了5届。在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之际,第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为5位获奖人颁发了奖项。获奖的5位国际人士分别是:施舟人(荷兰)、狄伯杰(印度)、约翰·奈斯比特(美国)、潘仕勋(英国)、饭塚容(日本)。

据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介绍,本届特殊贡献奖的评选与往年不同,一是扩大了评选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为主,而是由驻外使馆、相关组织和国际友人推荐,从全球范围内筛选;获奖者身份则扩大到译者、汉学家、作家和国际出版人。二是设立了奖金,获奖者每人将获得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汉学造诣颇深的施舟人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和宗教学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从事汉学工作50多年,施舟人说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色。他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化经典和相关书籍,出版后也常常受到读者欢迎,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距较大,施舟人也常常感到译介的困难,谦虚地称自己翻译得并不好。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一直牵扯着他的 人生轨迹,他在中国的老师、已故的季羨林、任继愈等先生的帮助也给他以鼓励和支持。施舟人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经典应该随着中国地位的不断 提高而在国际上为更多人所了解。目前,施舟人正在主持由国家汉办组织的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的翻译工作。

在印度教授汉语文化和文学的狄伯杰深感中国文学在印度的推广不够,为了让更多的印度人能够用当地语言接受中国文学,他开始了翻译工作,第一部作品就是将柯棣华的回忆录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狄伯杰还选取了中国古代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诗词作品共80多篇,用了8年时间,从中国古文翻译成印地语。他说,中印两国古老文明应该在当今世界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武装冲突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应该从地缘文明出发,通过文化的力量达到相互理解。

作为第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唯一一位出版人获奖者,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及印刷管理总裁潘仕勋的出版理念是:共同推动知识传播,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的出版物如何用地道的英文表达。潘仕勋说,在翻译过程中,中英文的字对字翻译能保持原文风格,但可能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所以他要求出版物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但尽量保持原文风格和文化角度。如果遇到中西方不同文化视角,则会在注释中从西方文化视角向读者做相关解释。潘仕勋介绍说,剑桥大学出版社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批关于中国科学与文化类的书籍,目前,他们正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计划出版一套“中华文明史”系列,共计30本,预计将于明年进入英美市场。

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1967年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4年,他见证了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心态的变化,由此,开始写作关于中国的书。他的作品《中国大趋势·成都模式》在本届图博会期间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饭塚容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已近40年,曾翻译过铁凝、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说,这40年也是日本广大读者对中国文学从好奇到接受 的40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强烈的好奇,加之当时日本出版业的发达,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很受日本读者欢迎。中国文学在日本出版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世界上也并不多见。亲历过中国文学译出日本的盛世,饭塚容也经历过日语引进的艰难时期。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出版界失去活力;同时日本又缺少职业的翻译家,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困难重重。饭塚容说:“文学翻译是付出很多、而收获很少的艰难工作。因为日本人并无与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在翻译时不得不苦思如何让日本人接受本身不太熟悉的中国文化。”虽然如此,饭塚容还是很感谢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令我感受到中国作家独特的审美、智慧和灵感,给我的翻译工作带来无数乐趣”。